



“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定位与生态意义

陈立新 周章领

摘要:通过揭示自然界生成为人以及自然界的历史性质,马克思形成了以“感性自然界”为关键词的自然观,达到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切理解,由此必定与当代生态思想和生态实践有着本质性的联系。“感性自然界”的自然观,有助于纠正“抽象自然界”观念的虚妄性,克服资本原则抽象统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性使用,为认识当代生态问题之成因开启合理的理解方向。

关键词:自在自然界;感性自然界;抽象自然界;资本

晚近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学术研究,直截了当地把马克思思想与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勾连起来,力图为社会大众发现或塑造一个“生态马克思”^①。据说,这是出于为马克思主义发掘和补充一个生态学理论维度或元素的良好愿望。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思想意图的价值或意义,在此也无意于专门评价其是非得失,而是要挑明:如果把生态问题的哲学考量合乎逻辑地归结到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根本问题,那么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清晰可辨的思考,对于当今针对生态问题的诸种思想和行动,理当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而只有达到马克思切入问题的原则高度——存在论高度,人们才有可能领悟马克思这一深思之最关本质的意义。为此,我们将以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语境为依托,根据马克思的哲学存在论立场,致力于探讨马克思以“感性自然界”为关键词的自然观,发掘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当代生态思想的本质联系,及其对于当代生态思想以及生态实践的意义。

一、“自然界生成为人”

马克思曾认为人有两种自然。其一,“自身的自然”,即人的肉体生命及其特性;其二,“身外的自然”,即在人之外的与人的生存相对待的自然界。这两者又分别称为“主观自然界”和“客观自然界”^②。

由于人这个物种原初即出自于自然界,遂有“人来源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等等说法。不过,一旦完成了在物种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人就踏上了永远不能摆脱也不可逆转的自我创生之路,人“自身的自然”或“主观自然界”就与原初的自然界相距越来越远,成为与身外“客观自然界”相对待的力量。在当今所谓的消费社会,人的身体即“主观自然界”成了“最美的消费品”和“最美的关切之物”,以至于“学会阅读自己的身体”被视之为当代生活的一种时尚。这种生活境况形式上显示了人把“自身的自然”当

^① 参见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侯晓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作“身外的自然”来看待和处理,实质上则是以调侃、诡谲、扭曲的方式标识了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鲍德里亚说:“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①当代生活衍生的这类场景,虽然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某些怪诞的性质或变异的情况,但恰好证明了人对“自然”的不可遏止的要求,或“自然”在人之为入过程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样说来,我们侧重分析人的“身外的自然”,该是顺理成章的。

马克思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②毋庸赘言,这段论述的主旨就是“人靠自然界生活”。具体地解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寓意:其一,自然界一方面为人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则提供生产资料。这是指自在意义上的自然,亦即人的“身外的自然”。其二,无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它们都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基本条件,对于人的现实生存从而成为自身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正因此故,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里所说的自然界,已经从前述的自在意义中跃升出来,获得了新的意蕴——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界”。其三,用“身体”来表述自然界之于人的意义,既标识了自然界获得了现实性的基本方向,又意味着作为人生存条件的自然界并不是先天地给予了人,人并不能现成地享用自在自然。其四,在现实生活过程中,人把“身外的自然”转变为人的“身体”,不是人时有时无的偶发奇想,而是现实生存筹划中的“普遍性”,对于人的生活有着性命攸关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亦可说是每个人皆不能推脱的生存命运。

就此要问:人把身外的“客观自然界”转化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这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是人的一时兴趣还是人的固有本性?

的确,世间万物中,唯有人才提出如此这般的现实要求,也唯有人才矢志不渝地诉诸行动而使这种要求变为现实。“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③不消说,这里所表达的区别乃是关键性的。

在马克思看来,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直接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④。这就在关乎问题之根本的意义上标明:其一,人的生命活动源地地具有“在内—在外”互动共生、相映成趣的特质。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意识,且贯穿于生存活动的始终。也就是说,人们时时刻刻都要使用自己的意志和意识,人的意志和意识总是处于出场的状态。这就是人所具有的“在内”性质。不过,人们借重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决非蜗居于密室中孤芳自赏,而是通过与身外之物打交道表现出来。这就是人同时拥有的“在外”性质。正是在揭示并把捉身外之物之时,人们确证了自己的“在内”性质。换言之,人们依寓于“在外”的对象,就是对“在内”性质的真正持守^⑤。其二,既然把观照“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自己生活筹划的基本要求和内容,那么,人源始地就是一个自己作为对象同时又需要对象的对象性存在物,意味着追求对象即是建构自身。毋宁说,人就是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来建构和守护自己的存在,对象性存在物必定是要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性。正是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创造“对象世界”,人由此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自由的现实存在物**。

这样就十分清楚,人原本就是沉沦于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创造对象世界”乃是人之生存建构的基本性质,而创造对象世界首要的目标无非就是改造“身外的自然”。这是因为,对人而言,自在形

①参见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9、141、1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页。

⑤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73页。

态的“客观自然界”不可能直接地满足人的需要,人总是要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意义上作用于自在自然界,依照自身的“内在的尺度”扬弃自然界的自在形态,使自在自然界合乎人的目的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就表现为人的“作品”,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也把“人靠自然界生活”标识为人的“现实”。人的“身外的自然”就在这种意义上成了人的“身体”——“无机的身体”。由此可见,“客观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不是人先天获得的,也不是人现成即可使用的;自然界之为人的“身体”,纯全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向人生成,并始终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而为人拥有。于是,我们毫无例外地看到,经过人的对象性活动,身外的“客观自然界”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成为“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这就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或曰“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过程。

一旦“自然界生成为人”,自在的“客观自然界”就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转化为“感性自然界”,甚或说就被“感性自然界”所取代。正是在“感性自然界”的基础上,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从而才真正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既然如此,当“感性自然界”作为人的“感性意识”的“对象”时,人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然界,从而“人的自然的本质”就得到了确证;当“感性自然界”作为满足人的“感性需要”的“身体”时,自然界直接就是“人的感性”,就是另一个“感性地存在着的人”,从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乃是无须赘论的真理。就此言之,“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①。

这种实在性,借用费尔巴哈的一个说法,乃是“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②。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依据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论性质而构筑的认识路标。经过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发现和思想创制,人们能否切中自然界的本性从而有助于筹划自己的现实生活,毫无例外需要以“感性自然界”为指标。倘若达不到这一指标,我们完全可以谈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但无可争辩地将与自然界的真正性质失之交臂;我们也完全可以谈论马克思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但无可争辩地错失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生成为人”的存在论境域。在思想史的演历中,这等缺失注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当代生态问题的性质,已然形成了深入领悟马克思深思的迫切要求。

二、自然界的历史性质

“自然界生成为人”的揭橥,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利用,无疑在关乎问题之根本的意义上赢获了一个合法的视野——当且仅当深入到人对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嬗变中,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抽象谈论自然界,而与现实的自然界相遇。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道说了真相,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的葡萄园和别墅。”造成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力量乃是人的感性活动^③。我们从此可以引申出马克思赋予“感性自然界”的又一个存在论寓意:自然界的历史性质,或者说“历史的自然”或“自然的历史”。施密特与此有关的一个评价可用作证词:“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④

从本质上来说,历史是专属于人的。相应地,自然界的“历史”性质,其实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属人”性质。毫无疑问,这是“自然界生成为人”思想的延伸。如果说,通过论证“自然界生成为人”,马克思揭示了“感性自然界”的实在性——一种由人的对象性活动或感性活动的参与而来的实在性,那么,自然界的“历史”性质,无非就是要阐明“感性自然界”的现实性——自然界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变迁中成为现实生活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194、196页。

②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8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7页。

④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页。

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①。这就本质重要地厘清了自然界之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范围和真正意义,形成了一个能否真实合法地把握自然界的认识标杆或界限。这就是说,马克思由“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沉思提醒人们,自然界进入现实生活世界,不是自动地成为人的“现成在手”之物,而是人在筹划生存活动中“使用上手”的成果。还原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我们立即可以发现马克思这一提示的重要性:只是资本降临人世间并跃升为社会生活主导原则之后,自然界才稳定地获得了被人“使用上手”的存在性质;从此以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照面的自然界,就始终是具有这种性质的自然界。

从自然界的历史性质中道说“现实的自然界”之存在可能性,马克思的用意可谓超凡脱俗,与众不同。这里特别让流俗困惑不解之处在于,近代以降,实证科学知识大行其道,被社会大众视之为知识之榜样和认识之理想。在如此这般的时代文化氛围中,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这一思想,以至于可以把握自然界的现实性呢?现实的自然界难道不就是我们当下一望而知的外部世界吗?即便是立足于当今的生活状况,这样的追问仍然可以振振有词地提出来。因为人们轻易就可以找到为这类追问添加底气的依据:一是马克思这一思想无法帮助人们形成或达到一个确定性的实际运用,自然要被那些实证的、直观的、近便的知识和方法所湮没;再者,人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自然界,莫不是那些冷冰冰的、僵硬外在的、不可捉摸的身外之物或现象。无须过多分析,我们在此能够看出,前者关乎于能否把握和达到马克思思考的原则高度——存在论境域,后者相关于能否认识和超越自在的自然界。不消说,这两种情况的否定性回答,恰恰构成了一个稳固广泛的认识语境和理解框架,组建了社会大众对于自然界之性质和意义的基本认识或判断。全部问题的要害正在于,人们驻足于自在自然界,无视自然界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变化,固执于抽象地谈论外部自然界的实在性、独立性、异己性,也就忽略了“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

的确,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自在自然界来设计自己的思考。因为这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浅显道理,马克思不至于糊涂到否认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得到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也不可能像费尔巴哈那样,鼓动人们“顺应着自然生活”^②,而是致力于思考和揭示自在自然界的存在论意义。由于世间唯有人以自身生存的方式守护存在,从而存在的意义源始地属于人,所以,马克思就是要解答“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③阅读这段论述,我们能够领略到马克思对自在自然界的尊重,但更为重要的体会,则是马克思对于转化自在自然界的存在形式以及促成这种转化的力量的强调。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依照自身“内在的尺度”扬弃自然界的自在形态,使自在自然界变成合乎人的目的并满足人的需要的形式,自然界就成为人的“身体”。这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由此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性活动的实际开展,实现或完成了自在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这就是自然界在人的现实生存中的真实意义或真正性质,亦即马克思所道说的“现实的自然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还是津津乐道自在自然界的实在性,或者固守着这种实在性,这难道不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现实的想象吗?人们的现实生存筹划果真需要这种不切实际的抽象迷思吗?这种高傲地抽离于现实生活变化而又意识不到自身根基之虚妄的认识,长期引领着社会大众的思考方向,对于当今所谓的生态问题是不是有着观念误导的责任呢?人们对这种认识岂能依然听之任之?

不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确明确提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我们就此试作简要的解读。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3页。

②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

马克思在剖析费尔巴哈谈论“自然科学的直观”时指出,就连“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得以存在,因为这种活动乃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接着,马克思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如果我们的视线仅仅到此为止,也许能够得到上述流俗所希望的东西。然而,马克思随后的三句话,作为不可缺少的补充或发挥性质的论述,立即提醒人们不应做出这种“停留”^①。

(1)“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这是说,在远古时代,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纯粹由自然原因而产生,受着血缘和地域等自然因素的支配或役使,实际上就是自然界。本来就与自然界处于同一存在状态,人类谈论“外部”自然界,不过是讨论自身内部的事情,当然谈不上什么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了。

(2)“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这句话的理解尤为重要。首先,这里所说的“这种区别”,是指“外部自然界”对于“自然产生的人”和“作为人的人”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其次,如果“外部自然界”对人具有“优先地位”,那么,人一定是与“外部自然界”不同的东西,否则当无从谈起。再次,“自然界生成为人”以后,自然界具有了“人的本质”,同时人也具有了“自然的本质”,自然界就是“另一个”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很明显,在“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视野中,自然界与人已然和谐不二,何来“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

(3)“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这句话最直接的提示,就是费尔巴哈作为现实的人,生活在“感性自然界”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中。“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对于诸如费尔巴哈这样的现实的人来说,就是“外部自然界”。不过,这种自然界在今天就是指“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或者是指与此同类性质的其他地方。但是,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是根本不存在的自然界。

由此可见,马克思针对所谓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或“纯粹的”自然科学,强调“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目的在于提示自然科学安身立命的真正基础和可能限度,间接地告诫自然科学不应走向忘乎所以的骄横与狂妄。这里不仅没有重返自在自然界之存在论优先性的意图,毋宁说更为精炼而深入地凸显了自然界的意义乃在人类历史形成过程中生成的基本观点。倘若再结合《资本论》对于“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批评和拒绝,马克思实际上阐扬了“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境域,并立足于这样的原则高度把“现实的自然界”之合法性展露出来,由此标明自然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动摇的真实性质或状态。

三、启明生态困境之多重成因

我们已经阐明,在“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境域中,马克思描述了“自然界生成为人”的故事,阐说了“现实的自然界”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正当性。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理论阐说,不仅坚守了切中现实、贴近现实的存在论原则,而且通过彰显现实的人乃是引发自然界发生变化之主导力量的基本论点,而表达了一种责任担当和理论真诚。由于生态问题的核心无非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所以我们当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克思的自然观对于当代所谓的生态问题有着不可否认的发言权和解释力。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当代生态思想具有毋庸置疑的本质联系。这样说来,当今学术界否认这种联系的那些相关评论,当然不值得一驳。倒是那些肯定这种联系的相关评论,可能持守着不同的存在论原则,自然需要予以辨析。

我们认为,若只是立足于自在自然界的原则立场而肯定马克思的自然观,马克思自然观与当代生态思想的联系比这种评价所期望的无疑要少得多;若认为马克思信奉“普罗米修斯主义”而以人类征服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然为荣^①,马克思自然观与当代生态思想的联系比这种评价所期望的无疑要多得多;若主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中心原则”,甚至以此为据而指证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有一个“生态学上的断裂”^②,马克思自然观与当代生态思想的联系比这类评价所期望的无疑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简要枚举的这几种富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是肯认马克思自然观而凸显其当代意义的评价,我们尚且不能苟同,自然更不用提到那些否认马克思自然观的评论了。这种情况实际上标明,马克思自然观之于当今学术界思考生态问题的意义,还没有如其所拥有的那样充分地呈现出来——也可以说还没有被人们充分地意识到。究其原因,这与马克思关于“感性自然界”的深思有关。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达到马克思切入这个问题的原则高度,没有领悟马克思由之而来的分析视野,我们还能不能倾听马克思的呼声?倘若不能,我们果真可以弘扬马克思的精思吗?答案不言自明。本文已经交代,我们从“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境域可以获得一把标尺,用来度量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合理、出了什么问题、在何处出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如果毕竟不能否认这些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轻易地撇开马克思的这些思考呢?问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自然观之要义一直讳莫如深,这是不是某些个别的特殊的因素所造成的遮蔽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归因吗?显然不能。从问题表现出来的性质及其所覆盖的范围来看,我们更相信有其出现且持存的必然性——一种与时代构成元素有关的必然性。我们在此主要是指“抽象自然界”观念和资本原则的抽象统治。

第一,关于“抽象自然界”的观念。

这里所谓“抽象自然界”观念,既指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抽象物”的观点,也指疏离于自然界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地位而“现实地想象”这种情况。从当下学术界的思想动态来看,后一种情况为“抽象自然界”观念的主要表现或典型特征。这种自然观念之所以流传,首先当然是因为社会大众的朴素认同。的确不应讳言,“无论我们把自己支配自然界的技术力量扩展到何等地步,自然界永远保存着一个不向我们打开的实体内核”^③。正是这样,在朴素直观的认识中,人们总是以自己身外的自然界为依据来确定自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特别是在自己行动受到自然界的制约时,便毫不犹豫地归因于身外自然界的异己性,而根本不顾包围自己的乃是“现实的自然界”。这就是说,社会大众朴素认可的自然界,实际上游离于现实生活处境,不过就是人们的心理想象物,是一个引导人们思维的抽象符号。要害在于,这样一个心理想象——“抽象自然界”——建构了社会大众对于自然界的集体认知和集体记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借用辩证方法才能把握的现实的“感性自然界”,如何进入人们的视野,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哲学史背景来看,“抽象自然界”特别是由黑格尔奠定了存在论基础。

黑格尔把精神当作原始的“种子”,世界这朵花永恒地从这唯一的种子里生长出来。而精神的外在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然界就是精神外在化的表现形式。换言之,自然界就是从构成其存在之根据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界并非仅仅相对于精神才是外在的,而是“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④。毋宁说,自然界的存在无非就是对精神的确证,精神是自然界的“真理性”和“终极目的”,自然界是精神的“真正现实”。那么,自然界由此而来的性质究竟如何?

黑格尔指出,在外化自身而又返回自身的自我活动过程中,精神的现实的存在就是抽象。抽象思维是精神的“最高的内在性”,是精神“真纯的自身”。有了它,精神才能回到自己本身。作为精神的表现,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自己的对象,其实即是凭借抽象设定“物性”。作为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物性”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不过是“纯粹的造物”、“抽象物”。于是,自然界作为精神外化的表现,不过是名之为“自然界”的“思想物”,就是“抽象的自然界”。这样一来,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

①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9~150页。

②参见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第134、140、143、173页。

③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④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2页。

在的,抽象思维也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而与抽象思维对立的自然界,本质上就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物”,已然被设定了被扬弃的命运^①。

可以说,黑格尔对于“抽象自然界”之存在性质及其出路的论证,堪称透辟深刻,至今仍无出其右。倒是马克思一语道破了“抽象自然界”的实质:“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②

这样一来,“抽象自然界”观念在根基上的虚妄与亏欠,便昭然若揭。这种自然观念坚持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也能明确把自然界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其实都是虚有其表。一旦不考虑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势必也会忽略人对自然界的责任,这就会导致有着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认识偏差。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始终处于主动的位置,是主导变化的承担者。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责任,与主动放弃责任担当没有什么两样,毋宁说这就有意无意地默许了人对自然界的强权,甚至发挥了怂恿的作用。由此可见,当代生态问题的出现,仅从流俗拥有的这种自然观念来看,的确事出有因。可以相信,只要这种自然观念继续霸占着社会大众的想象空间,当代生态问题的解决就依然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之中。

海德格尔有一个论断用在这里可谓切中肯綮,也耐人寻味:“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③这就告诉人们,自然界作为一种“存在者”,无疑彰显着“存在”;人与自然界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以人承担的责任而表现出稳定性和恒久性;这个责任就是人要“看护”自然界,以此守护着“存在”,人也就同时实现了自身的生存筹划。不消说,这与马克思“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境域异曲同工。就此而言,我们能够无视马克思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意义吗?

第二,资本原则的抽象统治。

众所周知,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以后,自然界所发生的变化,除了由自身力量或原因引发的之外,人类的力量越来越成为首要的推动力,而且是唯一的一支能够和自然力相抗衡的力量。近代以后,自然力量逐渐减弱,人类力量不断增强,以至于当代生活境遇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自在自然界被感性自然界所取代。就此可以说,如果当代所谓的生态问题已然不可否认,那么这不过是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了问题;而全部问题之所在的核心,无疑是人类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纯是自然界自身的改变。倘若把自然界的变化还原到人类社会运动的宏大背景之中,我们能够发现,正是在资本降临人世之间之后,自然界才开始进入了“永远的不安定”之中,并从此以后始终遭遇了不是以自身的力量而是以人类的节律为轴心的变动。请看马克思的评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④

这段我们皆耳熟能详的论述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自然界的价值,并史无前例地利用了自然界的价值,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从此我们可以推论,正是在资产阶级仿佛使用“法术”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时候,生态才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生态问题是在资产阶级的活动中形成的,资产阶级对于生态危机无疑难辞其咎。

依马克思之见,资产阶级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把资本的意义或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生活运动和体系。如果说资产阶级真是用了什么“法术”的话,那就是把资本原则所蕴藏的具有建构性质的巨大能量和动力淋漓尽致地绽露出来。还因为这一原则超越了时空限制、至今仍如日中天般地存在、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和影响的力量。当然,以资本为原则的现实生活世界,陷入了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之中:“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2、2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0页。

③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0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①

还是马克思一语中的:“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②所谓用“劳动时间”去衡量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实即推行“可计算性”的评价标准。于是,在资本构造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确能够运用并享受着自己的“独立性”,但无一例外地都是植根在“物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上,依照资本原则厘定的半径不停息地进行绕圈运动。正是这样,资本的“抽象统治”遂成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现实生活过程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此组建起来。

资本的本性即是唯利是图,资本原则的“抽象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和确证资本的本性。基于此,这一原则的现实开展,因为只有资本才能具有独立性和个性,所以资本无疑要排斥个别、否认差异、放逐感性。在现实的人这一端,活动着的个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社会生活消灭了“作为人的人”,而建构了“作为物的人”;在自然界这一端,自然界被当作一个现成地摆放在人们面前的“容器”或宝藏,人们可以不断地从中提取或搜刮财富。而且,资本原则通过利益驱动和引诱,把实证自然科学变成作用于自然界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已经自不待言,关乎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还有可能不陷入困境吗?

虽说由此澄清了问题及其成因,但我们必须予以警觉的是,这些困境是以生活总体状态出现的,而无关乎个人。“这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所做的那样。”^③这样当能使我们相信,当代人对待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与其致力于寻找一个不可能有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毋宁说更应该锚定问题之症结,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感性自然界”的深思不就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吗?

The Ontology Positioning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erceptual Nature”

Chen Lixin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Zhou Zhangling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By revealing the generating human nature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nature, Marx established his own view of nature - “perceptual nature”, which accomplished the complete comprehen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His perceptual nature view has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practice. “The perceptual nature” view helps to correct the nullity of “the abstract nature”, and surmounts the nature’s destructive utilization by the abstract rule of capital principle, and it indicates the reasonable dir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free nature; perceptual nature; abstract nature; capital

● 作者简介: 陈立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whuclx@126.com
周章领,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4页。